

安徽師範大學圖書館
建館六十周年紀念文集

(1928—1988)

**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
建馆六十周年纪念文集**

(1928—1988)

一九八八年四月

目 录

前言.....	(3)
改革的时代和哲学的改革.....	文秉模 (5)
学词散记.....	宛敏灏 (18)
黎锦熙先生诗集序.....	张涤华 (30)
《禹贡》“锡贡”、“纳锡大龟”、“禹锡玄圭”解	胡澍咸 (40)
说《正纬》.....	祖保泉 (47)
楚文化和屈原.....	潘啸龙 (57)
“补苴罅漏，张皇幽渺”.....	
——重读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	汪裕雄 (89)
象——中国艺术论的基元.....	朱良志 (111)
包拯集编年考略.....	杨国宜 (131)
夏燮评传.....	王世华 (153)
安徽历代词人知闻录.....	孙文光 (168)

前 言

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从1928年4月省立安徽大学的创办算起，迄今已有六十年的历史了。六十年来，由于历史的原因，我校曾数次分合，几易校名，先后经历了原省立安大和国立安大、安徽学院、安徽师范学院、皖南大学、合肥师范学院等主要阶段，我馆也随之迭经变动、历尽沧桑。但是，经过几代人的辛勤努力，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目前仍是安徽省的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一座图书馆。

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现有中外文藏近200万册。据1978年出版的《中国图书馆名录》统计，我馆藏书量在全国图书馆和全国高校图书馆系列中均名列前茅。这些藏书，基本上满足了全校师生员工从事教学和科研的需要，并为社会提供了有效的服务。尤有特色的是，馆藏中的23万册线装古籍书，收罗了中国历代著名的典籍和皖人著述，其中仅地方志一项，即有1021种15116册。我馆的古籍善本，在国内亦颇有盛名。经过初步著录，现有善本257种、664部、4589册。其中明洪武刻本《洪武正韵》是国内唯一全本；元至正八年（1348）刻本《春秋胡氏传纂疏》、元刻明递修《通志》、明弘治刻本《韵补》、明嘉靖刻本《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等，也有很高的价值。有些书还经过名家收藏和题识，如顾炎武、王渔洋、傅增湘、盛宣怀等，弥足珍贵。此外，还藏有台湾省商务印书馆据大内文渊阁藏本影印的全套《四库全书》。

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成长，是同学校的领导人和全体师生员工的关心和支持分不开的。在建馆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征集了部分文科同志的文章，编成这本文集，以示纪念。对于所有爱护、帮助图书馆的同志，我们表示深切的感谢。为了适应我校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了充分发挥高校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和情报职能，我们今后仍然需要得到大家的热情关怀和有力帮助，以期在提高素质，完善服务，实现科学的、现代化的管理方面有所进步。我们全馆同志将竭尽自己的一点绵薄力量，为安徽师范大学的兴旺发达，为教学、科研的蓬勃开展，为培养更多的合格人才作出应有的贡献。

1988年4月

改革的时代和哲学的改革

文秉模

哲学的改革和现代化的问题，是当前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十分热衷和广泛讨论的一个重大课题。早在50—60年代，南斯拉夫、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提出这个问题，并陆续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哲学与改革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等问题也越来越引起我国广大哲学工作者的关注和兴趣。尤其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社会各个领域改革实践的深入，以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和各种社会思潮的涌现，他们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认真的哲学思考，努力探讨哲学现代化的方向和途径。

改革的时代需要改革的哲学，而改革的哲学只能是对改革的时代的思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改革和现代化的问题，是当代的社会实践本身提出的现实课题，又是人们对时代的挑战思考的产物。一方面，当今时世，风云变幻，各个国家及其人民生活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社会历史呈现着新的发展动向和趋势。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随着现代工业生产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广泛地谈论所谓“变革浪潮”、“浪潮撞击”，各国都在赶浪头，竞相发展，准备迎接新的“信息社会”的到来。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观去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经

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生活和交往方式的变化（而不是旧的思想观念和现成的公式去“剪裁”现实材料），正确地说明其社会现实和发展趋势，已是刻不容缓的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社会主义的实践一改故辙，冲破单一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模式，走上了民族化、多样化发展的轨道。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解放思想，用各自的方式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本国的历史和国情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各显其能，创造性地探索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变化、旧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改革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民族化，带来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策的多样性，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更新和改革提到日程上来。另一方面，当前世界所面临的新技术革命浪潮，是推动社会改革和人类进步的伟大“技术催化剂”。这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又是一场全球性的竞争。在这场空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挑战”面前，社会学家、未来学家、社会预测学家的论说相继出现，各种社会预测和社会改革方案争长论短，各国都在研究新技术革命的性质、特点、内容、趋势及其社会后果，面向未来，思考未来，采取对策。历史证明，科技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先导，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发展是推动哲学发展的主要动力。以微电子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和普遍应用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不仅从根本上改变着社会物质生产的方式，而且深刻地改变社会精神生产的方式，从而全面地影响和促进整个人类文明，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与自己时代文明相适应的内容和形式。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是时代的客观需要，当今的社会改革和科技革命汇成巨流，有力地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应当说，“现代化”是随时代的更迭而变化着的动态概

念，因而在不同的时代，哲学的现代化也有不同的涵义和内容。马克思有句名言：哲学家应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121页）所谓哲学的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哲学的时代化，即怎样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的问题。从历史上看，时代的改革与哲学的改革，就象马克思早年所说的“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的关系一样，息息相关，互为需要。哲学不仅是时代改革的反映，而且是时代改革的前导，它来源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指导实践。然而，从总体上看问题，哲学往往是落在时代的后头，对于某一时代的哲学观念决不能和该时代的实际生活同时得到。这是因为人们对社会生活的思索，“总是采取同实际生活相反的道路”，“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2页）于是，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时代文明的灵魂的哲学，在其历史发展中不断地遇到，它所反映的时代精神同已经改变了的、新的时代精神的差距和它所体现的文明同向前发展了的、更高的文明的差距。缩小或消除这种“时代差”和“文明差”，便构成历来的哲学现代化的实质内容。由此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化的问题，就在于：省察和消除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同随着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了的社会现实和文明状态的间隔，使它更加富于时代气息，真正发挥当代文明的灵魂的伟大历史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本性说来，是一种创造性的开放体系。一个多世纪以来，它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成为促进人类进步和文明发展的巨大力量。这是历史事实。既然如此，它为

什么还面临改革和现代化的问题呢？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十九世纪时代精神和文明的结晶进入世界的。它和任何时代的理论思维一样，是一种历史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哲学源于特定的社会条件和思想资料，它的观念、范畴和体系结构是与其出现的世纪相适应，并以自己时代的文明水平和知识结构为基础。因此，恩格斯十分清楚地告白：“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2页）正是历史地局限着的时代条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带有自己的历史性和时代性。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也不可能说明一切；从来也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要求把它当做超历史的、“必须普遍遵循的哲学历史公式”。相反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历史地、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并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地扩充、丰富和发展这些原理。没有这种历史观点、历史态度和历史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前进，认识在深化，真理本身也在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发展，就必须面向生动的实际生活，正视社会的变革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善于从中吸取营养来除旧更新，“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列宁选集》第3卷，第26页）今天的时代已完全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也不同于列宁和斯大林的时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日新月异，世界各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划时代的变化，不仅创造了人类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更新和

繁荣提供了新的社会条件和科学基础。当代的社会变革和科学进步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哪些新问题，为马克思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什么样新的可能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如何去“消化”和“包容”新的社会实践和科技成果，从而正确地反映自己的时代，指导并促进当代的社会改革和科技革命？这就是五十年代以来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共同关心和致力探讨的焦点。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使苏联、东欧和西欧的哲学家展开一系列的论争，例如“体系之争”、“实践之争”、“认识论之争”、“科技革命之争”，等等。这些争论表明，对改革时代的哲学思考和哲学自身的改革是密切不可分的。

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的必要性时，我们还应当看到，从二十年代后期起，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党与党、国与国之间盛行一种不寻常的关系准则，在理论上形成固守教条而反创新，唯有个别领袖可以阐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理论界却无所作为、死气沉沉的局面，凡超出传统框架的研究都被视为“背离”或“自由化”。这些有形或无形的束缚严重地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常发展。其结果，直到五十年代初，全世界只知道一个社会主义的模式，即“苏联模式”；只知道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这就是以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为蓝本的体系。五十年后半期，各国共产党开始解脱已往教条主义的束缚，依据时代的需要和本国的实际去发展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这种特殊的历史情况，使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尖锐地提出：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是否贯穿着社会主义实践和新技术革命的现代课题这样一种时代精神？如果不是，怎样来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用什么样的体系和方法来反映时代，满足时代的需要？近三十年来，世界上一直谈论所谓“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复兴”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自我意识”，各国哲学界都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改革和创新。纵观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舞台，艳丽多采，错杂繁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由于各国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民族传统不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理论思维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和形式，这不仅是一种必然的，而且是十分可喜的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植根于各国的现实生活，在实践中不断地为自身的发展开辟愈益广阔的道路。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多样化倾向，不免也产生“副产品”，即五花八门的标榜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这是必须警惕和认真对待的。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当国外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审查和认识“苏联模式”，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的哲学体系，自由自主地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我们却开始搞个人崇拜，禁锢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哲学上的公式化和简单化、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日趋泛滥，竟至“两个凡是”的绝对主义和形而上学。我国哲学界摆脱教条主义的桎梏，改变自己的精神状态，创造性地去审视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还只是近几年的事，比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界要晚得多。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现实，不可低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面临的现代化任务。现在，我们已经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也应当去探索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改革和现代化是国际性的伟大事业，是一项时代性的宏伟工程，决非一朝一夕所能见效的，它的实现有赖于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艰苦努力和共同创造。目前，我国的哲学改革从何着手，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具体途径？对此，人们尚有不同见解和讨论。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

“理论的方案需要通过实际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7页）国外的经验也已经表明，每一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计划”或“纲要”，都是长期的系统研究的成果而出现的。就我们的现状来说，首要的是实际研究和实际经验，要多做些实际工作，多采取一些实际步骤，去切切实实地改变哲学与改革实践、科学潮流脱节的局面，把哲学研究的重点移到现实生活上来。哲学研究必须立足现实，面向四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国内外现实实践的研究中展示未来，只有这样才能给人们以理想，启迪他们的智慧去不断地开拓和创新，完成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崇高任务。

哲学的改革，要求哲学工作者具有准确而深刻的时代感（或时代意识）。哲学是时代精神的思维，或者说，被意识到了的时代精神。有了时代感，我们就能够唤起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自觉地去追随和思索时代精神发展的脉搏。顺便指出，在国外，人们在考虑哲学的改革时往往并提“何谓我们的时代精神？”和“何谓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个问题。这并不奇怪，因为要回答和解决“何谓马克思主义哲学”，即什么样的哲学才能成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首先要研究和把握时代精神是什么。怎样去研究时代精神，使自己具有时代感呢？对于这个问题，众说纷纭，有人主张对现实生活作“立体分析”，有的则要求对现实生活进行“结构原理的分析”，还有人认为要对现实生活加以“系统工程的分析”，等等。上述主张，尽管说法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要求对当代社会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系统的总体的研究。我们既要看到中国的社会现实，又要看到外国的社会现实；既要了解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又要了解资本主义世界的变化；既要把握当今社会进步

的宏观，又要明察它的微观；既要说明人类社会的今天，又要预测它的明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哲学学说都是以鲜明的时代感为基础，反映并回答了自己时代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因而它们充满生机和活力，成为时代的理论旗帜。实践是哲学现代化的根基。我们必须防止和克服那种为各自时远离时代的现实生活而拘泥于陈旧的条条和概念的诠释的、经院式的超脱主义态度，投身到时代的现代化洪流中去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人类社会是一个“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活的有机体”，它具有多层次的复杂结构。就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来说，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新的状况，带来新的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造成新的社会心理和新的时代精神。因此，哲学工作者要培养自己的时代感，领悟时代精神，不仅要自觉地置身于政治的、经济的改革实践中，而且要敏锐地觉察和细密地研究各种社会思想、社会心理和社会需求的新动向和新变化。哲学历来都是由有概括和创新能力的思想家和知识分子的复杂而艰巨的脑力劳动所创造的。列宁说：“知识分子之所以叫做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最有意识、最彻底、最准确地反映了和表现了整个社会的阶级利益的发展和政治派别的发展。”（《列宁全集》第7卷，第30页）哲学工作者的时代感越是强烈，就越是能自觉地反映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和人民群众要求变革的社会心理；而这种反映越准确、越深刻、越彻底，就越加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改革和发展，影响其社会作用的广度和深度。

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内容、体系结构、社会职能的现代化问题，哲学研究的方法、手段和体制的现代化问题，哲学研究队伍和哲学理论教育的现代化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问题，

都有待我们去做系统深入的、专题性的研究。现在比较突出的是要改变哲学工作者的知识结构和有步骤、有计划地组织应用哲学的研究工作。现实生活迫切要求哲学工作者具备与当代的知识生产和知识更新相适应的、富有应变能力的、合理的知识结构。哲学是人类知识体系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它本身又是概括和总结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而成的动态系统。“精神的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变而改变”，而精神生产的不同方式和水平产生不同历史时期哲学的差异性。然而，哲学的发展并不总是与自己时代的精神生产状况和知识水平的变化同步，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哲学认识也和其他认识一样，总是受着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例如，社会政治环境、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形式、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民族形式、文化遗产和思想资料、民族的理论思维能力、国际交流和外来思想影响等等。这里，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哲学自身的内在矛盾性，即是说，哲学包含着内容与形式、个别与一般、部分与整体的矛盾。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哲学，内容上主要是反映发展变化着的社会存在和社会经济形态，而它的形式则主要是由哲学家们凭借从过去继承下来、并依据新的内容和条件加以改造的方法和手段，加工、提炼、概括而成的。哲学又是个体意识和社会意识的辩证综合体。它的素材来自于个人意识和其他各种社会意识，它们经过哲学家的复杂的、艰巨的思维活动转化为理论化、系统化了的的社会意识形态。人们对现实世界的哲学认识是哲学家理论思维的创造。他们知识面的广狭和所掌握知识的深浅，以及思维素质，直接影响其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图式和认识能力，造成对现实的认识差异，进而制约着整个哲学发展的状况和水平。这就要求哲学工作者随现实的发展去吸取新的知识，推陈出新，不断地调整、改变自己的认识能力和知识

结构。否则，哲学研究就必然面临“知识老化”（或信息老化）的严重局面，在丰富多采的现实面前失去应变力而去穿凿附会地把活生生的实践放到陈旧的概念框架内，结果不仅难以把握现实，而且最终会堵塞哲学发展的道路。哲学的改革是破旧创新的辩证发展，我们只有更新知识，具备灵活合理的知识结构，才能从系统上全面地认识现实事物的不同结构和层次、不同因素和功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引导人们认识改革，推动改革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改变不合理的知识结构，克服知识的局限，要改革哲学研究的方法，打破以往的学科划分和它们之间的“信息壁垒”，有效地开展多学科协作。这不仅是扩大信息量，促进知识结构更新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实现哲学改革和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在知识一体化的时代，没有多学科的、“立体结构型的研究”，任何学科的现代化都难以实现。在国外，许多哲学家早已指出哲学的“专业化”和知识的“精密化”给哲学研究工作带来的“经院化”、“烦琐化”的倾向，十分重视哲学研究的“综合化”，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当前，对于我国哲学界来说，尤为迫切的是文理合璧，结成同自然科学的联盟。哲学和自然科学的“不解之缘”，由来已久。科学的发展，不仅是振兴经济、推动历史的有力杠杆，而且是繁荣哲学的重要前提。当代的社会生活过程已经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受到科学力量的控制并按照科学知识得到改造，以致不理解科学及其社会作用，就不能全面地说明现实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貌，更无法预见未来的社会状况。科学活动（包括哲学研究）在本质上是一个协作的过程。在几千年的哲学发展史上，科学推动哲学的前进，哲学指导科学的发展，哲学与科学的相互隔绝和“孤军奋战”都带来人类认识的衰落和退步。更新哲学工作者的知识结构和

改革哲学理论教育是休戚相关的。可以说，现今哲学的状况决定着现今的哲学理论教育的状况；而现今的哲学理论教育又将决定未来的哲学状况。因此，改变知识结构，不仅仅是哲学工作者个人的知识更新问题，而且关涉全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的提高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社会命运和前途。须知，任何社会意识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命运，首先取决于它们满足需要的程度如何。我们目前的哲学理论教育基本上遵循原理加例子的模式去传授一些现成的答案和结论，从教材内容、教学方法到教学手段，都难以给人们以创造性的思维方法，引导他们面向四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化、应用化和现实化。改革哲学理论教育，迫在眉睫的是编写具有高度科学性和权威性的哲学教科书，给全国的哲学理论教育提供基本的依据和准则，避免“分散编写，大同小异，相互重复，缺乏创新”的局面。在这方面，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国已由国家有关部门直接干预和审定，编写出理论联系实际，具有一定水平和特色，并适合不同对象的各种教科书和教学资料。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对我国的哲学理论教育是有借鉴作用的。

再说应用哲学的研究问题。现代科学已突破传统的学科界限而高度综合和高度分化，日益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融化汇合起来，形成文理渗透，纵横交错的庞大知识系统。同时，它也表现出高度分化的趋势，产生了一系列新兴学科以及综合性的横断学科和边缘学科。其次，哲学处于社会意识形态体系的“最高层”，它通过其他意识形态的中介环节反映社会经济基础，并给政治、法律、道德、艺术等诸意识形态以理论和方法论指导，而它对社会的作用是通过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相互联合、相互辅助来实现的。

-因此，哲学研究不仅不排斥，而且需要具体的社会领域和社会现象的探讨。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哲学也以坚实的基础理论研究作为基础，但它不能只有基础理论而缺乏应用研究。我们要在哲学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根据社会实践所提出的新问题，建立应用学科，开展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道德哲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管理哲学、哲学人类学、未来学、科学学、哲学学等学科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化、现实化必定会扩大观察现实生活的渠道，繁荣我们的哲学研究，加速哲学改革的步伐。

在哲学改革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还必须系统地研究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认真地吸取并借鉴其成果和教训。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哲学改革起步晚，还刚刚提出问题，另一方面，吸取别人的成果和经验教训，可以大大提前我们的起跑线，缩短差距，少走不必重复的弯路。据知，近三十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围绕哲学与时代、哲学与改革问题而展开的研究，范围广泛，争论繁多。它不仅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体系、结构、方法和职能，而且深入到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运动观、时空观、意识观、实践观、自然观、社会观、科技观、逻辑观、范畴论，以及科技革命中的哲学问题的专题研究。从总体上看，他们的研究有两个基点和主旨，即回答和解决两大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关系，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关系。这两个问题也正是我国哲学改革所要回答和解决的主要问题。因此，毫不奇怪，我们现在所遇到和讨论的许多问题，国外哲学界先已提出并以不同方式探讨过；近年来，我们的哲学研究所经历的步骤与道义也和